

西方作为他者

——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

王铭铭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作为他者

——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

王铭铭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王铭铭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10

ISBN 978 - 7 - 5062 - 8699 - 2

I. 西… II. 王… III. 西方国家 - 文化 - 研究 - 历史 - 中国 - 古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757 号

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

著 者:王铭铭

策划编辑:吴兴元

责任编辑:张跃明

特约编辑:杨 宁 马春华

营销编辑:邹长斌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编 100070)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 插页 3

字 数:140 千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营销咨询:133 - 6657 - 3072 010 - 8161 - 6534

编辑咨询:133 - 6631 - 2326

读者咨询:onebook@263.net

ISBN 978 - 7 - 5062 - 8699 - 2/C · 19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我欠了不少人情分,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举若干与本书相关者,则有必要。1989年我在伦敦萌生对于中国“西方学”的兴趣,当时,我正在学习人类学,得到当时 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老师们的教导。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工作,前辈费孝通(已故)、Stephan Feuchtwang、潘乃谷、Marshall Sahlins 等教授给予了弥足珍贵的鼓励及启发。这些年我将多数精力花费在所谓“中国研究”上,无暇顾及在“西方学”方面的“业余爱好”。要感谢那些以正面或负面方式为我腾出时间以构思这本小册子的机构与同行;这些时间,对这本不成熟的小册子之形成至为关键。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于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讲座”(2007年春季)讲授过。我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向来局限于关注中国自身,从人文观点看,这一“中国主义”,致使我们无意识地将中国割裂于世界之外。鉴于此,1998年,我提议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开设“海外民族志讲座”这门课,以擅长于研究“他者”的人类学为切入口,重现古代天下观之下的异域视野,探讨其对中国人类学未来走向之启发。以我有限的可怜的学力,要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以国族主义方式强烈表达出来且“深入人心”的年代里说清楚这一非西方异域视野的价值到底为何,实在不易。要感谢给我“胡言乱语”

之机会的学生们,他们的理解即为鼓励;与他们的交往,使我更深刻地感到,需要珍惜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所著的作品,要以它们为一面镜子,反观我们自身的形秽之处。所以,也要感谢这些既已故去的前辈们,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是我们的学术自尊心的主要内涵。

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资助,虽则并非直接相关于“民族问题”,但是被列为该中心课题成果,实在属于我个人之荣幸。

几点说明

1. 本书为一篇“扩大式论文”，它虽带有人文色彩，但系属社会科学（人类学）反思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世界活动与他者（others）观念，触及古史，却绝非考证或史学之作。

2. 本书又似可谓某种“学术史”（它比较大量地涉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思想），但又致力于呈现古代中国“西方学”之演变的以下五个阶段：

（1）上古时期内外关系“基本形式”之形成；

（2）秦汉帝国时期“神圣方位”的东移；

（3）汉魏南北朝时期西天观念之诞生及“神圣方位”复归于西的进程；

（4）隋唐帝国时期到“晚期帝制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与海洋世界密切相关的“南海”与“西洋”观念的产生与异域方位观念的转变；

（5）以古代“西方学”各阶段之积淀为历史基础的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史”。

关于上述阶段划分之认识旨趣，作者已在“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中作了部分解释（见《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14～288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此处增添了一代前辈学者

对“夷夏”方位、中国政治经济史的地理空间移动过程、中外关系史等方面之论述。

“西方学”除了阶段性的变异外,也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1)“他者中心主义”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方学”(如叙述佛国朝圣的“西方学”);

(2)以帝国文明中心为上的“朝贡主义西方学”(如以叙述海外风物与“人情”为主旨的异域志);

(3)混合了“他者中心主义”和“朝贡主义”之旨趣与内涵的“西方学”(如《穆天子传》)。

综合型的“西方学”为基本形式,为其后衍生的不同方位观念之“源”。尽管类型的区分对于展现历史之变是关键,但历史上不同的类型之间交叉重叠及同时并存是常态。

3. 本书中“西方学”一词所带之引号表示此处所讨论的,并非一门学科。我有意模拟 1970 年代以来西方后殖民主义思考中使用的“东方学”(或称“东方主义”或“东方论”),以探询中国历史上之与相近的表达方式。“西方学”指代带有世界活动旨趣的地理言论,为正文所言之“真实地理”与“幻想地理”之综合文本。

书写这一“文类”的谱系(特别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帝王、僧人、使者、旅行家、商人的“旅行史”),目的在于借助于它来反观今日社会科学的“世界想象”之认识主体问题。今之所谓“西方”,多以“世界认识者”的面目出现;其“在场”之前提,为“缺乏认识能力的被认识者”之存在。中国“西方学”之求索意在指出,“被研究者”也是认识者,而“认识者”也是“被认识者”。因而,为人们所虚拟的认识者—被认识者关系,应得到历史的反思。作

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的符号,“西方”这个称谓,已成为“东方人”追求的未来。而当这个意义上的“西方”被放置在诸如中国“西方学”的历史中考验时,则会出现某种有意义的“方位—势力逆转”。中国古代的“西”字,指好些地理单位,与西方的“东”字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它先是指西王母的国度,继而指西域,接着又流转到印度西天,到宋元以后,又与海洋,渐渐出现“西洋”概念。近代中国的“西方经验”(包括“西方冲击”),乃基于这些历史经验的心态积累而产生的。动态的“西方”视野,敦促我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世界处境”,又敦促今日之西方认识者(如致力于异域研究的人类学家)对其自身方位加以相对化。

概言之,本书写作之目的还在于从具有文化特殊性之中国历史中再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

4. 2007年3月8~9日,基于以上思考,我召集了一次题为“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观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主题与本书所述内容紧密相关;会议论文及发言,已刊登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4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 本书引用的旧著中不少已于近年重印为简体字版,引及这些旧著时,依据的主要是新版,故引文注释只在必要时在正文或者脚注中说明初版年代,而不再列出其原始出处。

王铭铭

2007年8月5日于大理兰林阁

目 录

插图目录	(1)
致 谢	(1)
几点说明	(3)
一、再思“西方”	(1)
二、穆天子与他的世界	(19)
三、“幻想地理”与“真实地理”	(39)
四、西方的东方化, 东方的西方化	(49)
五、乱世与西天之间	(61)
六、西域、印度与南海	(79)
七、海上丝绸之路与异域志的发达	(101)
八、岛屿、中间地带与欧化进程	(115)
九、“非西方”与他者认识	(145)
引用文献	(170)

插图目录

图 1. 1 斌椿《乘槎笔记》	(4)
图 1. 2 《乘槎笔记》书影	(5)
图 1. 3 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官员	(7)
图 1. 4 《东方学》作者萨伊德	(8)
图 2. 1 汉代石刻西王母像	(22)
图 3. 1 西汉末酒樽上的西王母图像摹本	(44)
图 4. 1 傅斯年	(52)
图 4. 2 禹贡图	(53)
图 4. 3 顾颉刚	(54)
图 4. 4 秦泰山刻石	(57)
图 4. 5 秦始皇	(58)
图 5. 1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壁画	(65)
图 5. 2 法显像	(70)
图 6. 1 法显天竺取经路线图	(85)
图 6. 2 释迦牟尼	(94)
图 7. 1 近版《岛夷志略》	(108)
图 7. 2 近版《真腊风土记》等	(108)
图 8. 1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	(117)
图 8. 2 昆仑奴俑	(120)
图 8. 3 《诸番志》	(121)
图 8. 4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 布朗	(123)

图 8. 5 郑和航海图	(132)
图 8. 6 利玛窦像	(136)
图 8. 7 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	(143)
图 9. 1 列维 - 斯特劳司	(148)
图 9. 2 葛兰言与他的太太及其著作《中国人之文明》	(155)

一、再思“西方”

1866年3月7日(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63岁的大清国总理衙门副总办斌椿,携其子广英及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彦惠,一行五人,在上海乘上了法国轮船“拉布得内号”。经过近两个月海上的颠簸,他们于5月初从马赛港登陆欧洲,在欧洲游历三个半月,行经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斌椿使团西行的任务,是对其在欧洲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加以详细记载,以资朝廷“印证”。作为大清国正式派遣出国的第一位官员,斌椿在欧洲受到了各国王室的热情款待。在其泰西之游中,斌椿对所有的非华夏事物与词汇兴致盎然,还不断以中国观念来“译解”欧洲。一个多世纪后,斌椿的西行一事,受到了致力于研究近代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的历史家之重视。比如,文史家钟叔河先生,便编校过其游记与诗作,且在其所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①一书中辟出专章,诠释了斌椿旅欧的历史意义。钟著在该书中提到一件令我关注的事。斌椿一行抵达斯德哥尔摩,受到瑞典“太坤”(太后)的接见。“太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

西方作为他者

坤”说：“中华人从无至此者，今得见华夏大人，同朝甚喜。”斌椿对答曰：“中华官从无远出重洋者，况贵国地处极北，使臣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他还当场吟诗一首赠予“太坤”：

西池王母住瀛洲，十二珠宫诏许游。
怪底红尘非不到，碧波青峰护琼楼。^①

对于已接受欧洲观念的我们而言，用西王母这个上古中国神话人物之名来比附瑞典太后，难免有几分可笑（钟叔河便讥讽斌椿说：“诗只能算随俗的应酬体，把瑞典太后比做王母娘娘也未免可笑”^②）。然而，140年前的斌椿对“西王母”这个意象的感受与我们不同：我们易于看到斌椿与瑞典太后这番“友谊交往”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地位，但却未意识到，确如斌椿在诗里所言，瑞典这个国度在一个遥远的“极北”，而其最亲善而威严之人物“太坤”，无论是形象还是地位，都可比中国神话中天帝之女西王母。



图 1.1 斌椿《乘槎笔记》

然而，140年前的斌椿对“西王母”这个意象的感受与我们不同：我们易于看到斌椿与瑞典太后这番“友谊交往”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地位，但却未意识到，确如斌椿在诗里所言，瑞典这个国度在一个遥远的“极北”，而其最亲善而威严之人物“太坤”，无论是形象还是地位，都可比中国神话中天帝之女西王母。

在以中国上古意象对于西方——即近代意义上的西方，而非我在后文将呈现的古代中国之西方——人物进行“译解”之时，斌椿有没有想到他当时的言语会成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67页。

② 同上。

为我们这些后人的“笑料”？故人已去，今人难以知晓他会如何思索。不过，有一点却昭然若揭：当我们说到这个“比附”可笑时，却必定是由于时代变了，我们再也难以理解他的认识姿态了。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即为天下，然而一百多年来，我们已认定中国是天下的一部分，而天下之中心已“西转”。如此，我们便不再以斌椿那一方式来进行跨文化的认识了。如今，人们更乐于做的，乃是反复讨论“西学东渐”，以这一历史的结局为中国文化的结局，以西方的语言为形容我们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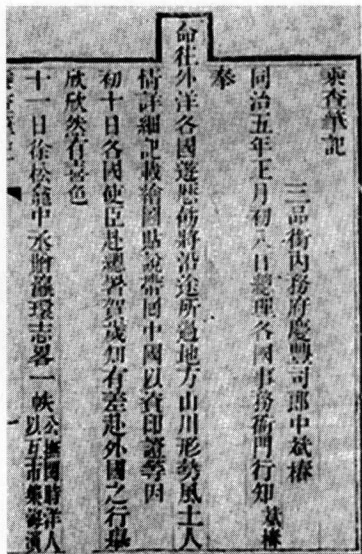


图 1.2 《乘槎笔记》书影

的“世界语言”。斌椿之所以在我们面前显得“可笑”，恰是由于在他的脑子里依旧存在的作为“文化密码”的西王母意象，而这个意象早已被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如今，西王母充其量只是作为神话人物，被处于现代社会科学之边缘的中国神话学家们谈论着）。虽则今日东西双方一些“发达国家”仍旧存在“帝制”和“王权”的神话，但与西王母意象之淡去的同时，我们自己的想象世界，也离我们的视线渐行渐远了。

以下的这些文字，并非专为斌椿之事而写；不过，在进入论述之际，我却感怀于斌椿那首被当下国人讥笑的“应酬体”诗作对于我们的启迪。于我，斌椿并不可笑，可笑之人乃为我们自己。在那个被我们视作“黑暗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年代，中国知识人在景仰他者——如作为清代之欧洲表征的“西王母”——时尚是充

满自信的。时下我们多以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我们已摆脱了那个“黑暗年代”,进入了“光明世界”。然而,我们却与自以为进入的时代形成了严重脱节。我们讥笑斌椿,说将一位欧洲太后形容为西王母,比附得太离谱;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知识已具备了西方所具备的,犯不着以我们自己的古老思想来观望包括我们自身的世界。由是,西方渐行渐近,再也不是上古神话意义上的西方;我们似只要把握了近代西方,便能把握自己。也正是在西方渐行渐近中,中国思想渐行渐远了。斌椿跨越海洋去欧洲游历的路途,依旧是我们在走的;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里程不再以自己的符号来标志,我们自己也以为,中国知识等同于其对自身既有的历史之切除。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使人想到的,正与我从事的这门以观念体系的跨越为己任的学科——人类学——紧密相关。人类学这门学科大致也是在斌椿访欧之时兴起的。或许可以说,斌椿被大清国派去欧洲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本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学的实践;不过,一如时下既已固定化了的“学术常识”所规定的,这种实践与产生于当时欧洲的人类学存在着一点不大不小的差异。

近代欧洲自以为占据了世界,若对之缺乏深度了解,便无以治理之,于是,自19世纪中叶之后,对于致力于研究欧洲以外地区中之民族、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给予了重视;而大清恐怕是出于其与欧洲关系中的挫折,才意识到这个世界还存在自己需要了解的“对手”,于是才派遣斌椿使团去了解欧洲。如果说斌椿在无奈中尚且保持着某种“不合时宜”的“傲气”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国力“显弱”,到了20世纪以后,作为他的后人,我们则已彻底接受了欧洲的认识方式,并以其对于我们的支配为荣。随着